



中非关系 与中国的大国责任

罗建波◎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非关系 与中国的大国责任

罗建波◎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非关系与中国的大国责任 / 罗建波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 - 7 - 5161 - 6955 - 1

I. ①中… II. ①罗… III. ①中外关系—研究—非洲 IV. ①D822. 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6371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林
特约编辑 宋英杰
责任校对 韩天炜
责任印制 戴宽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8
插页 2
字数 292 千字
定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论 “中国梦”携手“非洲梦”:中国的大国责任与 世界贡献	(1)
一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大国责任	(2)
二 中非关系六十年与大国责任的历史展现	(5)
三 中非合作理念与中国的国际道义	(9)
四 中非发展合作与非洲复兴进程	(12)
五 中非关系与国际秩序的变革与发展	(18)
第一章 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身份定位与 大国责任	(22)
第一节 中西方对中国国际责任的认知差异	(23)
第二节 中国大国责任的重要体现:推动国际秩序 变革与完善	(26)
第三节 中国大国责任的重要目标:维护并增进发展 中国家及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32)
第四节 中国履行大国责任的基本原则:量力而行、权责 平衡与互利共赢	(38)
第二章 合作理念:中非合作的原则、理念及其世界意义	(42)
第一节 平等相待原则	(43)
第二节 相互支持原则	(50)
第三节 互利共赢原则	(54)
第四节 自主性原则	(58)

第五节 “正确义利观” (61)

**第三章 民生与发展援助:中国对非援助与非洲的
减贫和发展** (65)

第一节 六十年中国对非援助的阶段性演变 (65)

第二节 中国对非援助的模式及特点 (74)

第三节 中国对非援助推动了非洲的减贫与发展 (85)

第四节 中国的大国责任与对非援助的发展趋向 (107)

第四章 安全合作:建设性参与非洲和平与安全事务 (114)

第一节 21世纪以来非洲安全形势变迁及特点 (115)

第二节 大国责任意识推动了中非安全合作 (119)

第三节 中非安全合作的理念创新 (122)

第四节 中非安全合作的举措、方式和途径 (132)

第五节 案例:达尔富尔危机的和解进程与中国国家
形象塑造 (138)

**第五章 经验交流: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与非洲的
能力建设** (151)

第一节 非洲政治发展大势及面临的治理难题 (152)

第二节 非洲国家的民族建设与中非经验互享 (157)

第三节 非洲国家的国家建设与中非经验互鉴 (161)

第四节 非洲国家的政党建设与中非经验交流 (167)

第五节 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历史价值与世界意义 (170)

第六章 中国—非盟关系:助推非洲复兴进程 (176)

第一节 非洲一体化的历史使命与成就 (177)

第二节 中国与非统组织的关系及其历史成就 (188)

第三节 当代中国与非盟关系的全面拓展与提升 (192)

第四节 中国与非盟关系之于非洲发展及世界体系
变迁的意义 (199)

第七章 多边合作机制:搭建中非互利合作的坚实平台	(202)
第一节 中国多边外交及其战略意义	(203)
第二节 中非合作论坛与中非合作	(210)
第三节 金砖国家组织与非洲发展	(226)
第八章 中国、非洲与西方国家的三边合作:如何更 有益于非洲?	(233)
第一节 西方国家对中非政策的评价	(234)
第二节 西方国家为何“关注”中非关系?	(238)
第三节 中西方在非洲问题上的观念分歧与政策差异	(241)
第四节 中西方能否在推动非洲发展进程中实现 各方共赢?	(249)
结语 中国在非洲:“天使”还是“魔鬼”?	(255)
参考文献	(269)

导 论

“中国梦”携手“非洲梦”：中国的大国责任与世界贡献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快速发展，显著提升了自身的国际地位与世界影响，中国日益以一个世界性大国的全新姿态屹立于世界舞台。曾几何时，国人多在谈论“世界之于中国”，而如今，“中国之于世界”早已成为世人热议的话题。

当前中国的大国复兴，在显著改变自身发展面貌、提升民众福祉的同时，也极大改变了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以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极大推动着世界经济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减贫与发展进程，极大推动着当今全球治理体系的创新甚至是国际秩序的变革与完善。中国日益由国际事务、国际机制的参与者向主要倡议者、推动者和贡献者转变，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甚至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对世界发展的塑造力和一定程度的世界领导力都在不断增加。中国已经成为影响世界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力量之一。

一个不断崛起的大国，自然需要富有特色的大国外交。21 世纪中国的大国外交，需要有与时俱进的外交理念创新、更具全球视野的大战略布局，也需要有彰显中国精神和中国气度的大国责任。我们需要在基于自身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在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和减贫，实施国际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救助，参与国际安全治理与和平建设，以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领域，承担起力所能及的国际责任。我们以为，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应当继续把非洲国家、发展中国家作为自身履行大国责任的重点区域，进而推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进程；应当继续维护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同时基于发展中国

家及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立场致力于推动国际秩序更为公正合理的变革与完善。中国通过不断增进的国际责任担当，不仅能显著扩大自身国际合作空间、提升自身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也必将更加有效地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和平与发展进程、国际秩序的合理变迁以及全人类共同福祉的增进。

一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大国责任

张百家先生在描述 20 世纪中国外交的演变与发展时曾言，“改变自己，影响世界”。^① 1949 年新中国的成立及此后中国共产党人对独立自主的坚持，曾以革命性的方式对世界产生过重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发展的主动追求，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中国大国复兴进程的显著提速及国力的快速提升，极大提升了自身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极大改变了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国以自身的发展再一次震撼了世界！

回想百余年前，在传统中国从兴盛走向衰败之际，在外敌入侵国土沦丧之时，无数仁人志士发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感叹，国运之衰可谓千年之未有。为救亡图存，挽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几代中国人前仆后继以求自立自强，变革图新以求民族复兴，中国在历经无数次的磨难与浩劫之后终于重新屹立于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夙愿正在变成现实。雄狮梦醒，昔日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始以一个世界大国的体量重新立足于世，古老中国通过自身改革和发展如凤凰涅槃般再一次震撼世界。这何尝不是又一次“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自己，如何认识世界？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一个世界大国，中国应该奉行什么样的对外政策，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什么样的国际角色，又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准确研判自身发展和世界发展大势，与时俱进地认知自身的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在此基础上有效统筹国内

^① 章百家：《改变自己 影响世界——20 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 1 期，第 4—19 页。

国际两个大局,妥善处理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外交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念和举措,在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同时,强调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弘扬正确义利观并致力于实现与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共赢,在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上更加积极作为。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对外工作要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①较之以前,中国外交更具全球视野,更富进取意识,更有大国风度。

一般意义上讲,大国外交有三种不同类型的含义:一是“以大国为交往对象的外交”,即一个国家无论大小,只要它以大国为其外交重心,都可以称之为大国外交;二是“大国间外交”,如二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当前时代的中美关系、美俄关系等;三是“作为一个大国的外交”,即以一个大国的身份定位来确定自身的利益诉求、战略目标并灵活运用相应的外交资源和手段。当前中国所言“大国外交”,应当是作为一个大国的外交,这是日益崛起的中国对自身地位和身份、利益与目标,以及应有国际角色的准确判断和应有表达。

不可否认,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人均经济份额、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以及其他社会综合发展指标来看,中国在相当长时期里仍只能算作发展中国家,更何况中国还有幅员辽阔且经济仍十分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以及按联合国标准还有超过1亿的贫困人口。正如外交部王毅部长所提醒的那样:“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发展不平衡仍然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发展中大国仍然是中国的基本定位。中国还并非富国强国,要让13亿中国老百姓真正过上幸福生活,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②但同时,中国也自信地认为,自己是一个大国。无论是中国的经济总量、人口规模、外汇储备,还是不断增长的对外贸易和投资,都表明中国并非一个普通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领域,对一个国家是否是大的评价,并不完全取决于该国的人均经济水平,而更多地看其经济总量及其总体国际影响力。从这个角度讲,中国无疑是一个大国。

^①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载《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第1版。

^② 王毅:《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载《人民论坛》2013年8月上,第8—11页。

即便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力并不强大之时，毛主席也从未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小国”“弱国”。“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确立，中国“重返”联合国，以及中国在亚非民族解放运动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都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新中国的战略远见与战略自信。中国出兵朝鲜以抗美援朝，20年后尼克松总统访华及两个大国元首的历史性握手，以极具戏剧性的方式向世界演绎了中国外交的大国气魄。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同样视中国为大国，而后中国相继提出的多极化主张、和平发展道路、和谐世界理念，以及中国梦和“世界梦”的提出，无一不是关乎自身发展和世界大局的宏大理念。

不过，我们以为，中国大国外交时代的全面开启，还是近几年的事情。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1世纪中叶中国成就全面意义上的伟大复兴，中国外交内涵大致会经历三个阶段的演变：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十年，中国外交在本质上是一种“主权维护型”外交，当时的外交任务在于维护主权独立，争取国际承认；第二阶段，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外交演变为“发展主导型”外交，外交服务于经济建设，推动国家发展；第三阶段，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伴随中国和平发展的深入推进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全面拓展，中国外交开始逐步向“大国责任型”外交转变。这一大国责任，既有对人民、民族和国家的责任，也有对国际社会的责任。

新时期中国的大国外交，首先要能更为有效地维护和增进自身国家利益，这是大国外交最为基本的诉求和目标。比如，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当今世界，如何更好地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在中国利益全球化的今天，如何更为有效地保护自身日益增长的海外利益？在各国都重视发展软实力的时代，如何拓展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其次，中国的大国外交还意在表明，中国将积极推动国际秩序的变革与完善，深入参与全球治理进程，负责任地承担与自身实力相称的大国责任。这是一个大国应有的责任担当，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一种期待。

如果说，以前我们的发展目标是“如何成为一个大国？”那么今后还将增加一个新的目标：“如何更好地做一个大国？”如果说，以前我们讲得最多的是国家利益，那么今后在继续强调国家利益优先的同时，也要更加积极地关注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和全人类的共同福祉。中国人

民在致力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国梦”的同时,也将通过自身发展和全球参与来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进程,推动“世界梦”的实现。由于非洲是当前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最为集中的大陆,是当前全球性问题最为突出的地区,因此中非合作的发展以及中国在非洲发展进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就成为中国展现自身大国责任与外交形象的重要舞台,成为世人认知中国及其全球角色的重要窗口。

二 中非关系六十年与大国责任的历史展现

笔者曾以“China in Africa: Devil or Angel”(《中国在非洲:魔鬼还是天使》)为题发表过一篇文章,就中国对非洲外交的本质和外交诉求进行过阐述。我们以为,如同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首先服务于自身的国家利益需求一样,中国对非洲外交也无需否认自己的战略利益诉求,比如寻求非洲的政治支持、获取战略资源、扩大在非洲的商品与投资市场等,但中国对非洲外交自始便有超越国家利益层面的理想、使命和抱负,这一点经常被西方人士忽视、怀疑,甚至是否定。^①如何更好地推动中国对非洲战略与政策的不断完善和提升,如何及时、全面地向世界阐释中国在非洲不断增长的世界责任,是当下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也是学术研究所应关注的重要课题。

国内学者谈中国的国际责任或世界责任,大多从20世纪80—90年代说起,特别是从21世纪以来中国实力快速增长及国际参与显著增加之后讲起。事实上,早在新中国成立之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怀有浓厚的国际主义情结,新中国在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同时,认为自己同属被压迫民族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一员,誓言联合亚非各被压迫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11条规定了处理对外事务的政策和基本原则:

^① Luo Jianbo & Zhang Xiaoming, “China in Africa: Devil or Engel?”, *Pambazuka News*, Issue 666, Feb. 19, 2014.

“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①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把帮助其他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斗争和正义事业看作自己应尽的国际义务，体现了中国外交的道义责任和国际主义精神。

中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先后同印度、印尼、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等民族独立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携手印度、缅甸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过，中国真正走向更为广泛的亚非世界，还始于 1955 年 4 月召开的亚非万隆会议。在万隆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力排众议，不仅成功阐释了中国支持亚非国家实现政治独立和政治团结的主张，也与埃及总统纳赛尔以及加纳、利比亚、利比里亚、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代表进行了直接沟通对话。也正是通过这次会议，亚非国家看到了中国支持反帝反殖斗争的坚定决心，看到了新中国平等待人、自尊自信的外交风格。这次会议的一个显著成效，是中国在此后几年内迅速地同埃及、叙利亚、伊拉克，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几内亚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的外交舞台不再局限于社会主义阵营及周边邻国，而是扩展至广大的西亚北非地区了。

在中国看来，通过支持第三世界的独立与发展，不仅能极大改善自身面临的外交孤立，而且也可以动员尽可能多的国际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体现了爱国主义（自身利益）与国际主义（国际义务）的高度统一。^② 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陈毅于 1963 年 12 月至 1964 年 3 月对亚非 13 个国家进行了友好访问，期间提出了中国同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发展关系的“五项原则”和对亚非国家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中国对非洲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物质援

^① 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1 页。

^② 周弘：《中国对外援助与改革开放三十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 年第 11 期，第 33—43 页。

助,甚至一度超过中国自身所能承受的能力。^①中国举全国之力帮助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修建了长达1860公里的坦赞铁路,是那一时期中国支持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最突出的历史见证。尽管当时中国对外援助的绝对数额不大,但它是中国在自身经济基础还十分薄弱甚至是经济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做出的,体现了中国对非洲国家追求独立和发展的深切同情和支持。

今天,中国已经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它同样有一个愿望,就是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尽力去帮助非洲国家实现共同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以非洲和发展中国家为自身的外交依托和战略基础,这决定了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责任主要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减贫与发展,促进世界均衡发展 and 南北问题的解决以及帮助尚处于动荡中的发展中国家实现政治稳定。中国的世界责任主要是对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社会负责,这是中国基于自身身份、利益基础上的外交选择。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访问非洲时所强调的,“新形势下,中非关系的重要性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双方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中方发展对非关系的力度不会削弱、只会加强”。^②

这一承诺的最为直接的体现,是中国通过多种形式推动中非互利合作的全面发展。中非关系早已从历史上以政治合作为主转变为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安全互助、国际上相互协作的全方位合作关系。在2015年12月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中方承诺提供600亿美元资金支持,在产业产能转移、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和平与安全合作等领域支持开展十大合作计划,推动中非合作全面升级,集中体现了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开始更多地帮助非洲国家实现共同发展。与过去中国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相比,当代中非发展合作开始更为紧密地结合非盟和“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设置的优先发展议题,把重点放在非洲国家迫切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培训、人力资

^① 据统计,中国在1956—1977年间向非洲国家提供了超过24.76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占中国对外援助总额的58%。李安山:《论中国对非洲政策的调适与转变》,载《西亚非洲》2006年第8期,第11—20页。

^② 习近平:《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3年3月26日第2版。

源开发以及和平与安全等领域，着力改善非洲的发展条件并提高非洲的自主发展能力。

当代中非关系的本质特点之一，在于通过构建全新的互惠互利关系来推动中非双方的共同发展。虽然中国对非洲外交在政策层面还有许多值得完善的地方，中国企业在非洲的社会责任意识也亟待提升，但我们日益清楚地看到，中非全面合作正在有力推动着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政治上的和平与稳定，中非合作所彰显的“南南合作”精神也成为当今发展中世界追求发展的重要动力。中非关系的发展及其世界影响，见证了中国和平发展不仅造福自身也必将惠及世界这一双赢、共赢模式。这种以政治平等为基础，以互惠互利为特色，以共同发展为依归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正在显现出越来越大的世界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大同”思想，用现代话语讲，就是世界要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要实现和谐相处。^①中国人自古就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远大抱负和济世情怀，不仅要实现自我发展，更要以实现天下大治为己任。21世纪以来，中国提出“走和平发展道路”并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提出“正确义利观”并推动与世界的互利共赢与共同发展，表明中国在以和平方式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以一种世界主义的宽广视野来审视自身的国际责任以及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虽然当前中国仍有待发展，中国关注的重心仍在于解决国内发展问题，但随着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世界责任意识必将继续增长。而体现这种世界责任最好的地方，就是在非洲。

笔者曾对一位欧盟的官员讲，欧洲和美国谈对非洲发展援助，或多或少带有一种赎罪感，因为历史上，它们在非洲要么有殖民历史，要么有贩奴历史。而中国谈对非洲援助与经济合作，则更多地是一种使命感，因为它没有历史包袱。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其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任何发展成就均是对人类发展的巨大贡献，而如果中国能够通过自身发展所创造的机遇带动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发展和富裕，通过全方位的互利合作关系来推动非洲国家的减贫与发展进程，必将极大

^① 罗建波：《中国对非洲外交：战略与政策》，载《新远见》2012年第5期，第21—25页。

提升中国外交的感召力、亲和力和影响力,提升中国外交的国际形象和道德高度。从此角度讲,非洲是中国展现大国责任的形象舞台,提升自身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的重要平台。接下来我们从四个维度来具体阐述中国在非洲的国际责任以及中非关系的世界意义。

三 中非合作理念与中国的国际道义

大国之所以为大国,不只在在于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还在于它能够对国际社会承担起特殊的责任,能够对世界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其中重要的方面是大国应当对人类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做出重要的贡献,这是一个大国应当具有的境界和精神。60年来中非关系所奉行的一些基本原则及其彰显的价值观念,反映了广大非西方世界对国际政治规范与国际伦理的思考,对长期以来由西方主导的世界价值观和国际规范形成了有力挑战,正在彰显越来越强大的道德引领力。同时,60年中国对非外交战略与政策及其所彰显的外交原则和理念,对创新富有特色的中国外交理念和国际关系理论,势必能提供许多极其宝贵的外交实践经验和富有价值的理论启示。

积极倡导并认真践行相互平等、相互支持的原则,是六十年中非友好合作之所以不断延续并历久弥坚的重要基础。西方国家经常不理解,为何中国能以相对较少的投入而赢得非洲国家的外交支持。原因自然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始终能以平等的方式同非洲国家相处,始终能设身处地去思考非洲国家面临的独立和发展任务并力所能及地给予必要的外交支持。这是经受过西方殖民压迫且至今仍处于国际社会边缘的非洲国家所特别看重的,也是中非双方因为共同的历史遭遇而能够相互理解和相互支持的地方。非洲人记得,20世纪60、70年代,中国曾帮助非洲国家修建了长达了1860公里的坦赞铁路,而那时中国自己还非常贫弱。非洲人知道,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把非洲视为“绝望的大陆”,而中国却逐步加大了对非合作,由此带来了中非关系的全面发展,推动了国际社会对非洲的重新重视。中国对非援助就数量而言仍难以与美国和欧盟比肩,但中国从来不以“捐助者”自居,不以“先富者”

自傲，而是始终强调中非合作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现代国际关系意义上的“主权平等”是欧洲人在17世纪中叶正式确立的，但这个所谓的主权平等只是欧洲大国、西方大国间的相互平等。在创立这个概念之时，欧洲人便开始征战全球，逐步用武力征服了广大亚非拉地区，先后把这些古老的民族和国家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下。即便是在20世纪亚非地区实现政治独立后，西方国家仍试图延续它们苦心经营几百年的世界秩序及它们在世界的霸权统治。在非洲，西方大国通过操纵政治选举、驻军或军事干预、财政与金融控制、语言文化和宗教上的扩张来维持与非洲国家的特殊关系，其虽有维护非洲国家的稳定与发展之意，但维系自身在非洲既有利益则一直是它们追求的重要目标。当今世界的国际秩序，虽然看似主权平等，这也是联合国所重申的最为基本的国际准则，但实质上还是不平等的关系，西方国家建立的国际秩序及一些强权原则仍然在延续甚至固化。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自与非洲国家接触时便始终坚持“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以这样的原则为基础来发展与非洲国家的互助互利关系。李安山教授曾强调指出，中国在非洲事务中所坚持的“平等”原则，是对西方国家奉行“强权即真理”原则的根本性颠覆。

致力于与非洲国家的互利共赢与共同发展，是当前时代中非全面合作得以不断深化拓展的又一关键因素。近代以来的世界经济体系是伴随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建立起来的，这是一种以西方为中心、以亚非拉地区为外围的等级格局。非洲国家的政治独立并没有彻底改变非洲经济所处的从属地位，欧洲殖民体系的失败也并不代表西方经济霸权的崩溃，而且后来美国的崛起更是加强了西方国家在经济方面对世界的控制。中国自与非洲国家接触开始，所奉行的合作理念就与西方国家有着天壤之别。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二、三十年里，中国为了支持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在自身经济十分贫弱的条件下对非洲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在非洲国家相继实现政治独立后，中国又于1982年适时提出了对非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即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开启了中非经济互利合作的新时代。这表明，在非洲国家大多实现了政治独立及中国实现改革开放之后，中非合作开始更多转向经济与社会发展，且这种合作的特点将是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在此之后，中国在强

调对非“走出去”的同时,通过技术转让、债务减免、技术支持、人才培养、人道主义援助等方式推动非洲的发展进程,当前更是紧密结合非盟推出的“2063 议程”优先发展目标,着力推动中非产业转移和产能合作,在不断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的同时带动非洲国家实现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

要推动实现与非洲国家的互利共赢与共同发展,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切实践行好“正确义利观”,这体现了中国通过“自我约束”和“自律”主动追求中非双方实现互助互利、共同发展的善意和美好愿景。中华民族从来都是一个讲大义的民族,讲情义、讲仁义、有信义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作为对中国传统义利观的继承和发扬,新中国成立后,在自身经济基础极为薄弱的情况下,对广大亚非国家和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给予无私支持与帮助。现在中国逐步发展了,更不应该忘记发展相对滞后的非洲国家。2013 年 3 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非洲时深刻阐述了“真实亲诚”的对非合作理念,在同年 10 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要以“正确义利观”推动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做到义利兼顾,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正确义利观”要求我们在开展对非合作时恪守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有时甚至要主动让利、重义轻利、舍利取义,做到先予后取、多予少取,必要时只予不取。同时,积极推动非洲国家实现政治稳定,在国际上注重维护非洲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应有权益。可以说,“正确义利观”就是要把中国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的利益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联系起来,把中国的国内责任与国际责任联系起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国梦”的同时,与世界一道致力于实现“非洲梦”和“世界梦”。

与非洲国家的互信、互利、互助与互援,体现了中国人一贯倡导的南南合作精神,这是中国外交之一重要特色,也是我们能够赢得广大发展中国家信任和支持的重要原因所在。南南合作的意义,不仅在于它能创造更大的贸易和投资机会,还在于它有助于发展中国家以集体力量来抗衡西方强权并逐步改善南北关系,从而为发展中国家营造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历史上,中国与其他亚非国家一道推动形成了“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许多非洲国家都是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的参与者,而中国也是这两个组织的重要关注者和支持者。21 世纪以来,中